

母亲的才智

■轻舟

母亲生于湘南鱼米之乡。解放前，据说母亲的父亲在县里做筑路工程的技术活，赚了一些银元，在家购置了一些田地，过上了小土地出租的生活。加上外公又懂所谓的“水师”绝活，常常为乡邻喷水接骨，人缘也佳。家里兄姐弟妹七人，母亲排行老四，正好居中，人乖巧，逗人爱，在父母家当了十来年的“准小姐”。

尽管受宠，但因长辈的封建思想较浓，母亲和她的两个姐姐并不能像哥哥弟弟，以及解放后出生的小妹那样，可以进学堂读书受教育。后来，母亲奉命为大弟作书童，断断续续伴读了二三年旧式小学，才幸运地没有成为文盲。

与父亲成家后，母亲从较开阔的小盆地娘家，搬到了较闭塞的丘陵山冲婆家，从此，“准小姐”变成了“新媳妇”和婆家乡邻嘴里眼里的“秀英嫂”。

婚后的头几年，母亲大都在娘家和父亲部队生活，直到有了两个孩子，才开始较长长时间居住在山冲里的自己家里。那时，我已有四岁多，开始有了些记忆。在与父亲分别的日子里，母亲带着我和大妹以及后来出生的二妹，住在村里分给的一间牛棚改建的偏房里。白天，母亲与乡亲们一道，按生产队的分派干农活，从杂工助工做起。由于天资聪颖，眼里有活，很快便成了插秧收割的好手，往往在比赛中领先。但“吃”的工分并没跟着往上涨，仍然只有六七分，尽管有想法，也没公开说。到了晚上，便就着煤油灯，给远在部队的父亲写信。母亲的字工整隽永，每封信大概三五百字，诉说着带小孩和劳作的事，更多的是一些思念恩爱的话，而父亲的回信，母亲一封一封仔仔细细地折好装好，收藏在她的嫁妆箱子里，从不允许我们翻动。直到我上了小学识得字后，母亲才允许我看了一次。

那时，农户有“四属户”（大概是干部、工人、教师、军人四类在农村家属的总称）的区分，我们家属于“四属户”的家庭。每个月母亲都会从乡村邮递员手中接过父亲寄来的汇款单，记忆中金额大都是5元，也有10元的但不多。每次母亲都要一个人或带着我，步行四五公里路，到镇上邮电所取款，有时顺带给父亲寄信或打个长途电话。由于每个月都有活钱，少数乡邻既羡慕也嫉妒，往往在生产劳动中给母亲设下小难题，母亲总不计较，也总能巧妙化解。大多数乡邻是对我们友好的，在需要出重体力时，总能主动帮助。平时，家里一旦有什么好吃的，母亲总要另外添出几小碗，分送给左邻右舍品尝。农余农闲时，母亲喜欢编织毛衣和缝制衣物，款式质量在当时当地数一数二，往往一个晚上就能织好一个小孩的毛衣，还能一边织一边与大家瞎话。织好的毛衣，除了家人穿，还要送些给那些帮助过我们家的乡邻，不时地还为乡邻们免费缝制一些小件衣服，深得乡邻们喜爱。

母亲是一个极感性的人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，母亲招工到县城，分配到当时极红火的县水泥厂工作，又被选入厂文艺队。无论是身份、单位还是工作，都是让一些人羡慕的。后来，有一个去地区专署参加学习培训的名额，组织上推荐了母亲，母亲也很高兴。就在整理行装准备出发时，母亲偶然从好友口中得知，好友将被下放回农村原籍（应该是三年困难时期疏散城镇人口）。好友死活不愿意回农村，但母亲却动了回乡的心思，立即找到领导，自愿放弃上派深造的机会，坚决要求组织上将好友下放的名额调给她。在母亲的一再要求下，正在焦头烂额的领导们只好顺水推舟地同意了。多年后家人谈及此事，母亲仍是一副自得的神情，不无调侃地说，没有当年她的坚持，哪能与你们父亲结成一家？哪里还有你们？一次，母亲也极认真地告诉晚辈，那时的她还只有十八九岁，正是特别恋家想家离不开自己母亲的年龄，但似乎并不后悔。

生活的磨炼，让母亲不仅仅保持了“感性”“理性”，也学会了理性坚强和特别“会打算”的本领。全家进城后，母亲最初几年没有安排工作，孩子由三个增加到了五个，全家七口人仅靠父亲一人的一份工资。父亲当时是一家地方国企的中层领导，每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四十元，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。母亲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吃的在厂区附近开荒垦地基本自给，穿的往往是只给大孩子添新，其他孩子穿的都是母亲熬夜改制的旧衣裤。父亲一年四季穿的是厂子里发的工作服和部队里的旧军服，母亲自己则只有两套衣服，冬一套夏一套，春秋乱搭，经常是夜里洗白天穿，冬天还要连夜用煤炉子烘干，用的几年都难得添新。真的是“三年开年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但在外人眼里，我们家大人小孩个个干净利索，精气神十足。那时，年老的爷爷仍在农村生活，父母每个月定期送生活费过去。时间一久，来去往返成本偏高，同时开支压力实在太大。母亲便做爷爷的工作，又科学压缩家里其他人的生活空间，将老人家接到了城里一起生活。真是难为了持家的母亲。

艰难的生活在母亲眼里算不得什么难事，感觉母亲最发愁的是如何维持父亲和儿女应该有的体面。有一年冬天，不知道刮的什么风，年轻人流行穿一种长近膝盖的雪花呢子大衣。在当时，这可是既时尚又奢侈，尚不懂事的我难免在母亲面前流露出些许渴望。没想到的是，几个星期后，母亲竟将一款崭新的半长呢子大衣递到了我面前。当时，母亲是含笑的，而我眼眶里的泪是强忍住的。我至今都不知道，我亲爱的母亲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，是如何为儿子办到的。

母亲还是一个乐观豁达之人，她在哪，热闹在哪、笑声在哪。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后来进城，母亲与邻里之间的关系一直融洽，而且能在短时间里成为邻里的核心人物，我们兄妹及朋友同学对此既羡慕又佩服。现在琢磨，她的法宝就是“明事理，吃得亏，不惹事，不怕事”。

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十八年了，有时在遇到一些棘手的矛盾时，总想着如果母亲还在多好啊！俗话说，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，但从待人处事的能力和水平看，我们晚辈与母亲还是有差距的，“青”未必一定就能胜于“蓝”。



读诗社风云

■周苡

手握这本淡黄底色洒些红墨点的小集子，已是白露过后，是日得闲好好读读。

记得那个初夏阳光灿烂的五月，我有幸参加了南岳诗书画社召开的2020年理事会。会上，年近八旬的旷瑜炎老会长充满激情地说：“南岳诗书画社的创社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，创办之初的规格很高、名气很大呢！当时，湖南唯有南岳、岳麓和洞庭三诗社，南岳诗社的创办者都是享誉海内外的大诗人。第一任社长是羊春秋，副社长是马积高……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承接诗社这一光辉的历史，勇于担起南岳诗书画社不断发展壮大重任啊！”旷老会长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，闪烁着光芒又充满了力量。

真没想到，南岳诗书画社还有这么大的来头；没想到，手中的这本《衡岳风骚》竟如此沉甸甸；没想到，我们肩负着如此重大的使命。

读中师时，教古汉语学的老师颇为自豪地向我们介绍：“我手中这本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啊，就是古代文学史专家、湖南师范大学马积高教授编写的，他可是我们衡阳人咧！”那仰慕之情溢于言表，所以至今还记忆犹新。

现在的南岳衡山大牌坊上还有马教授撰写的楹联两首：“天下数名山五岳之中称独秀，人文传太古六朝而后见多姿。”“北望神州擎天四岳皆吾友，南来胜景誉千秋是此山。”每次从牌坊经过，总会仰望名家所题的楹联，为生活在“文明奥区”而倍感自豪。

翻开目录，此辑分为“骚坛盛事”“五岳独秀”“神州揽胜”“盛世歌吟”“潇湘采风”“先烈缅怀”“湖海唱酬”“遣兴抒怀”“访古怀旧”“文革纪事”等十个栏目，选录了海内外诗友两百多首诗词。其中诗词最多的是“骚坛盛事”“五岳独秀”两个栏目，多是诗社成立的唱和及畅游南岳的抒怀之作，众诗友欣然歌赋，豪气冲天。

96版《南岳志》上记载，“1983年8月26日至29日，在南岳山庄召开了南岳诗社成立大会，同时举行了一次大的金秋笔会。这次与会者近200人。广东的广州诗社、荔苑诗社，省内岳阳市的洞庭诗社、长沙岳麓诗社都派了代表前来祝贺。海外新加坡南洋大学名誉校长、书法家潘受老人，寄赠了手写的贺诗中堂一幅。国内许多知名书画家李可染、黎雄才、钱君匋、赵朴初等，或题赠作品，或题赠屏额、对联……这次笔会与会者共作诗300余首，作画近100幅。”

随手翻开一页，竟录有日本诗人石川岳堂和石川忠久的诗作。石川岳堂慕名来岳，参加了当年南岳诗社的金秋笔会，

并直抒胸怀：“良夜更逢风雅会，两邦友谊豁心胸。”

序言是马教授亲自撰写的。开篇便直陈历史、直面现实：“然三唐两宋，光被千古；而四水三湘，罕见名家。惟楚多材，斯有愧矣。”读到此处，我不禁想起再次粗略翻阅《南岳衡山古今诗词集成》时，发现该书收录的从汉朝以来至现当代撰写的南岳诗词二万余首，汉代只有一首，晋朝三首，南北朝六首，隋朝一首，自唐代以后诗词数量逐渐增多，至清代最盛。确如马教授所言“而四水三湘，罕见名家”，让人汗颜。

接着，他深入分析了原因，并直陈现状：“至于现代，斯文益昌。然作者如林，小说独著。文尚语体，诗贵自由，唐音宋调，日就湮沉。顾瞻城外，殊有惭色。”从而，提出了他们在南岳创社的初衷：“希冀下之遗风，美月泉之韵事。于是招邀新故，结社南岳。标屈子之芳躅，扬二王之余烈。遣怀叙志，当盛世之鼓吹；激浊扬清，比野人之芹献。”其实在南岳诗社成立一周年时，马教授也曾以诗明志：“诗律久废弛，我友常痛之。结社南岳巅，永咏千云霓。”可见，他对弘扬中国传统诗文化的一片赤诚。

正如白居易所言：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诗歌合为事而作”。姜书阁、傅白芦、羊春秋、马积高、王晨牧、谭雪纯、胡遐之、康华楚等一大批湖湘文人贤士结社而起，壮抒激烈。他们对中兴古典诗词的强烈使命感，对南岳衡山真挚的故乡情，怎能不令人动容？

第一任社长羊春秋是湘潭大学教授、著名文史学家、诗人、韵文学专家、中国当代散曲界的旗手。在衡阳迎春诗会上，他激动地写道：“又见人家腊酒黄，迎春总为觅诗忙。”1984年5月，他在诗社组织的采风活动中，看到衡山政通人和、物阜民康，思潮起伏、感慨万端，写下了“矮墙高槛小溪斜，帘幕低垂笑语哗”“绿树红墙隐翠微，谁家翁媪醉扶归”等竹枝词数首……

南岳新春诗书画雅集、诗社金秋笔会、衡阳迎春诗会、名山揽胜等诗文会友的盛况，一时独领湖湘诗坛风骚。读着，咀嚼着，眼前浮现出一幅兰亭雅集、曲水流觞的盛世画卷，令人畅往不已。

“文公默祷开云句，杜老飘流望岳诗。赖有余音传今日，南风雅共扶持。（胡遐之）”读着读着，不觉天色已晚。然而当时众诗友为结社而作的豪情壮语，仍久久回荡在脑海。忽而忆起，新任诗社秘书长李静在此次理事会后，欣然写道：“拈峰为笔云作笺，更续衡岳大诗篇。”既是美好展望，亦是对吾辈的鞭策。愿携手同行，上下求索，不负先贤。

抬头望窗外，板栗林低凉风习。

故乡星空浩瀚

■何文胜

从入夏起，直到秋天，这样的傍晚就有一桩最惬意的事情可做——聚族而居的村落，各家都要搬出竹床、凉席、凉凳到蛙鸣虫吟、稻谷飘香中的禾坪歇凉。虽然是日复一日的躲猫咪、讲鬼故事，偶尔也有特别一点的——那就着美味的自制点心被大人教认星星——这依然是每天令人期待的事情。

北斗七星是最好的认的，以那么优美的造型高居天庭，具有很高的辨识度，教认星星大概是从它开始的吧。然后通过它的最边沿延伸过去，就可以找到尊贵的北极星，它的“恒久”不动和璀璨光亮，是引人瞩目的。大人们的经经验是，出远门，只要能看到北极星就不会迷路。

北极星在很多时候，与织女星是“两块牌子，一个机构”。如果说麻雀嘴是我童年的整片天空，那不得不不说外婆就是那颗“不变”的北极星。我想说，一般人家的主心骨并非一贯为出工出力的男人，反而是母亲、外婆这样主持“内政外交”的女人。

我没有单独试过夜晚走很远的路，但老辈们走过。曾经靠挑盐谋生，沉默寡言、一杆老旱烟不离手的外公，他们一帮人穿越省界的漫长旅行，途中还要殚精竭虑的避开一些关卡、劫难，那必然是要经常星夜出行的。那么，他们应该也是经常在北极星的指引之下回到故土，回到外婆所守候的屋场——因为那是家的方向。

情知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，但在外婆身边，于我却是从未感觉饥饿的童年。诸如加红薯的饭、用吊在柴火灶上的大铁锅将早稻米做成的“捞米饭”、过年朝节的各种小点心，在外婆一双巧手的料理下，也总是无比香甜，花样多多。卧室靠墙的五斗柜里，如同“育盒”一般总有一些令人期盼的东西。

我始终疑心自己是被特殊照顾的那一个孩子。因为能被称为“猛子”的，不仅要性情凶猛，还得体格健壮。而那个年代，相对瘦弱的人还是占多数。当年就有同村人因为打赌喝热稀饭而被烫坏了内脏，并很快离世这样悲惨的事情发生。

仰望星空，如若间或有一滴冰冰的雨点落到额头、脸上，就会有人说这是“星子屙屎”，无香无臭的，现在才明白应该是夜露凝结所致；倘遇着流星划过天际，那就会是一个不小的兴奋点。孩子们会欢呼雀跃，更要在大人的引导之下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许下心愿。只是现在那些许过的愿早已星云离散了。

而最纠结的故事莫如入夜后。大屋后山的背面是不去的，也没人家把房子起在那里，说是“阴气重”。那实则是一个山窝子，中间有一口很大的水塘，叫藕塘。雾气弥漫的清晨或傍晚，就会有红头发的女人在林子里梳头。这说法就像挥之不去的恐怖电影，吓得小孩们再如何好奇，终究都是没人敢去那里冒险的，而这恐怕正是大人们的如意算盘。

那时候，文化生活很单调，哪个生产队放电影都是大事，即使放的基本上都是早已“耳熟能详”的片子。邻近的人都成群结队去，一路聊着回，有人就会说“夜路走得早，容易撞到鬼”。只有皓月当空，或者满天星斗的时候，走在任何一条僻静的小路都不心慌。所以，选择通天大道，在阳光、月光、星光下走，终归是生活里最好的选择。

外婆过世较早，在我的感觉里，母亲接过了她的衣钵，成为我们的“北极星”。潜心教育，寄情诗翰的父亲在城市的周边奔波，反而如一颗行星。外公到城里来，在几个子女家里轮流住。他老而洁净，并无所谓的“老人气”；当年因为我吃饭不听从安排，愤而“也打碗”的外公，脾气也不犟了；瘦高的他总喜欢披着军大衣，戴着棉军帽而被喊作“座山雕”。外公在八十多岁的年纪，喜欢住我家。母亲也总记得给没了几颗牙的他做他喜欢吃的“蒸得糜淫”的红烧肉。

而礼拜天的下午，母亲经常要踩着供销社的运货三轮车，送我和哥姐仨去轧钢厂河边的渡口，我们再乘船过河，经白沙洲、一纺机、湘江农场、茅叶滩去父亲的学校。一个深秋的日子，在苗圃大茶树前带些转弯的坡上，因为避让一位行人，翻车了。母亲也没顾着自己，而是以极其迅猛的反应，起来查看我们。终因减速及时，穿得不薄，虽然全摔倒下来，也没受什么伤。加之那一带盘根错节的熟人关系，也就没有追究什么责任就算了。

我知道对逝者再如何思念都是无济于事，而且这思念甚至是一丝夹杂着针刺般疼痛的自我苛责。在世之时，若未能至孝，那越深的怀想也就是越深切的惩罚，有生之年，永难偿债。

爆米花

■祝平军

在小区门口的拐角处，偶尔会看见一位打爆米花的老大爷。

老爷爷跟前，盆、桶、篓、筛、罐一应俱全。打爆米花的设备很古老，也很陈旧，有一种岁月的痕迹。炉火烧得很旺，老爷爷一边摇着通体黝黑的罐，一边吆喝“打爆米花……打爆米花……”

然而，看得人少，买的人也少。我虽然经常路过，却从来没有买过。做法还是传统的，原料也还是以前的那些原料，但想必味道不再是儿时吃过的味道了吧。

远远望着通红的炉火，盛着爆米花清香的童年记忆一下子在眼前鲜活起来。

儿时打爆米花的是邻村的一位老爷爷。据年轻的时候当过兵，右腿上还挨过一枪，从那以后便落下了残疾。老爷爷孑然一身，无儿无女。后来，不知从哪里捡到一个小孩，从此后爷孙俩相依为命。

秋天过后，每逢假日，老爷子便带着孙女，蹬着一辆旧三轮在各村组之间穿梭。别看孙女小，却非常懂事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帮手。趁着放假，老爷子凭着自己的手艺赚些钱来贴补家用，或者过年时能为孙女买上一件新衣裳，亦或者是为孙女赚取来年的学费吧。

“打爆米花哟……打爆米花……”

只要那洪亮的吆喝声响起，我的耳朵也似乎跟着这声音唱和起来。那种声音，犹如天籁。那时候物质匮乏，小孩子能得到的零食很少。听到这种声音，也就意味着又可以美美地吃上一段时间了，但更重要的是等待爆米花出炉的那份欣喜。

我拿起搪瓷杯，掀开米缸，舀了满满一杯米，又从文具盒的最底层拿出平常节省下来的几角钱零钱，飞奔似地向外面跑去。

尽管我跑得飞快，但我前面还是排满了小伙伴们。大家围在老爷子的炉火边，七嘴八舌，脸上满是兴奋。当然，围在一旁的大多是像我这样对爆米花情有独钟的小孩。

老爷子端坐在小马凳上，他的小孙女则是在一旁往炉火中加些木头柴火。老爷子一只手不停地拉着风箱，一只手缓缓摇动着环状的手柄，一边说：“别急啊，孩子们，一个个来，很快就有得吃了……”

慢悠悠旋转的手柄发出的吱嘎声，像把我带入时空的列车之中。等锅里的气压一到，小女孩赶紧把装米花的布袋架好。

“孩子们，快躲开，要炸了……”

老爷子把米花罐搬过去，将罐倾斜，并用脚踩着，对准用竹蔑“打前阵”的大布袋，再用一根钢管把罐子上的顶盖用力一撬，“砰……”猛地一声巨响，把宁静的乡村炸得山欢水笑。米粒在葫芦形黝黑的罐中，如潮水似地涌向一个拖着长长尾巴的布袋子。久久等待的孩子们一哄而上，把炸飞的米花粒连土带渣地聚拢。

第一锅出来的爆米花，往往是老爷子自己带来的米，加了糖的，免费给大家品尝。也许是孩子们熟知了老爷子的规矩，纷纷把手中装满米的搪瓷杯放在一旁的三轮车上，有些灵泛的孩子则是帮着老爷子端着簸箕，好让带着一点金黄的的爆米花能够顺当地倾倒出来。

一簸箕的爆米花，就这样被众人你一捧我一把很快吃得干干净净。

看着孩子们开心热闹地吃完第一锅，老爷子便叫大伙排好队，自己一跛一拐地忙着去往罐中加米加糖，封好顶盖，又开始不停地拉起了风箱，缓缓地摇起了手柄……

童年的记忆如斑驳的旧屋，锁住了过往。而那些与爆米花一样忘不掉的故事，却如青苔铜绿生长在旧日的门扉上经年泛青。

想想如今的孩子们可供选择的零食琳琅满目，但恐怕没有几家孩子还能享受到这种食品。进城后，见到现代机器制作的爆米花，里面加上了奶油等高级佐料，但失去了岁月中的味道，吃了两次却再也找不到曾经的感觉。

老爷子已经不在了，曾经的那个小女孩应该也已经长发齐腰。乡村里估计也很难再看到这样打爆米花的了，老爷子的手艺恐怕也失传了吧。城市里失去昔日味道的爆米花，很难再温暖我经年的孤独。这也是我虽然看到小区门口依然传统手法打爆米花时，却再也不敢去尝的原因。

</div